



张维迎：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



文/张维迎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）

经济增长是一个新现象

对人类来说，经济增长是个非常新的现象。从旧石器时代算起，人类已有 250 万年的历史，即便从智人算起也有 20 万年历史，而经济增长只有 250 年历史，相对于 250 万年为万分之一，相对于 20 万年也仅有千分之一点二五，确实很短。工业革命之前，不增长是常态，增长是非常态，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，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。

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，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，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太大差别。18 世纪初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多少，平均寿命也没有超过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。就中国而言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，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，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只是过去 40 年发生的事情。

但过去 200 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均匀现象。伴随经济增长的出现，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也越来越大。1500 年时，从全世界看，人均 GDP 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也不是很大，但是从 1820 年开始，差距逐步扩大。到 2000 年时，最富有国家的人均 GDP 是最贫穷国家的上百倍。人均 GDP 最高的是西欧各国和文化制度同源国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，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这被称为“大分流”。这种大分流可以用人口数和 GDP 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描述。1820 年之前，这个相关系

数基本都接近于 1，也就是说，人口大国基本上就等于经济大国。1820 年的相关系数仍然达到 0.9423，但此后这个系数开始迅速下降：1870 年为 0.6393，1913 年为 0.3404，1950 年为 0.1554，1973 年为 0.148。也就是说，到 1973 年的时候，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，人口大国可能是经济小国，而人口小国可能是经济大国。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，人口数量当时占世界的 20%，但 GDP 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。只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两个十年间，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，大分流也在 80 年代末被大融合所取代。人口数和 GDP 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 2003 年上升到 0.5185。

人类有好奇心，看到这种大增长和大分流，就想提供解释。总结起来，学者们提供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：第一类是地理决定论：一国的经济增长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拥有的资源决定。其代表人物早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，最近几十年有历史学界的加州学派、生物地理学家贾德·梅森·戴蒙德 (Jared Diamond)、经济学家杰弗里·萨克斯 (Jeffery Sachs) 等。第二类是人种决定论：经济增长决定于人的智力，不同人种之间智力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。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。第三类是文化决定论：宗教信仰、价值观、伦理等文化因素决定经济增长。其最著名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 (Max Weber)，他认为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，而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增长。第四类是制度决定论：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。特别地，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，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。制度决定论

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有的观点，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·诺斯、达隆·阿齐默鲁（Daron Acemoglu）和詹姆斯·罗宾森（James Robinson）。我自己也持有这种观点。特别地，我认为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作用。朝鲜和韩国原本是一个国家，“二战”刚结束时，面临的情况很接近，但经过几十年发展以后，两个国家完全不同。

容易带来误导的两大经济增长理论

经济学家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关注制度问题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，关注的主要是技术性变量，这些变量可以划为两大类：一类是存量，包括资本、劳动力和技术；另一类是流量，包括投资、消费和净出口。这些概念都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两种思维方式：一种是供给侧思维，另一种是需求侧思维。第一种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，第二种属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。新古典增长理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·索罗（Robert Solow）于1956年创立。他在1957年又做了经验研究，解密美国在1900年-1950年这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源于哪些因素。之后经过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完善，他的理论就成为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。

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，整个经济被当作一个“生产函数”：生产要素投入是自变量，产出是因变量（一般用GDP来衡量）。技术存量决定生产函数的形式。同样的要素投入，技术越先进，总产出越高。最简单的生产

函数只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。遵循新古典范式，索罗假定经济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特征，劳动和资本各自贡献的份额加起来就等于 1，实际增长超出 1 的部分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，被称为“全要素生产率”（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，缩写为 TFP）。这样，比如说，如果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各增加 1%，由要素投入导致的增长就是 1%。如果实际产出增加了 3%，那超出的 2%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。索罗 1957 的研究发现：美国在 20 世纪前 50 年的增长，将近 80%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只有 20%来自资本和劳动的贡献。

这里，有必要对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做点说明。所谓全要素生产率，就是用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，因而是一个剩余量，即回归分析中的残差。如果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些其他投入变量（如土地、矿产资源）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降低了。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总是处于当下最有效的均衡状态。在此假定下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来自于技术进步。但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。经济并不总是处于均衡状态，新古典增长模型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既可能来自于技术进步，也可能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。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很重要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很大，主要是来自我后面讲的企业家套利活动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改进，来自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。

新古典增长模型在解释增长中占有主流地位，经济学家用这个模型度量了几乎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情况。我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实

证研究。

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王小鲁、樊纲、刘鹏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（《经济研究》2009年第1期），他们发现：在1953年—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，中国GDP平均年增长6.15%，其中2.66%来自资本投入的增加，1.71%来自劳动投入的增加，只有1.78%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占比不到29%。但在改革开放之后，无论哪个阶段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大幅上升。比如1999年—2007年间，中国GDP平均年增长9.72%，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.1%，占到整个贡献的42%。

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德怀特·珀金斯（Dwight Perkins）和匹兹堡大学的托马斯·拉斯基（Thomas G. Rawski）也曾对中国1952年-200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过分析（2008年）。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，1952-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11%，其中1957-1978年的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（-13%），也就是说，产出增长远低于投入增长，说明配置效率降低了。但改革开放之后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都是正的，而且相当高。尤其在1990年—1995年这段时间，经济增长的57.3%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这是巨大的进步。

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2012年的研究发现，在1952年—1978年间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（按人均GDP算）的贡献是-72.03%，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达52.25%，按单位产出计算的资本的贡献

是 116.15%，劳动参与的贡献是 3.63%。这意味虽然资本的投入非常大，但由于生产效率的降低，资源浪费严重，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增长。改革开放之后的 1978 年—2007 年这三十年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比达 77.89%。

当然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究竟是多少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分歧，依赖于作者使用的数据和模型的设定。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改革后显著高于改革前，是没有争议的。我要强调的是，这种转变主要不是由于中国自身有什么技术创新，而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，包括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都更有积极性了，表现出来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

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什么问题呢？

第一，这个理论假定技术是外生的，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没有考虑什么因素推动了技术进步。

第二，新古典增长模型只关心资本的数量，不关心谁控制资本，谁来投资。在新古典模型中，不论谁投资，结果是一样的。由于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，谁都无法为力，惟有资本是人可以控制的，新古典增长理论客观上为政府主导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这确实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信奉的理论。但实际上，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，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效果完全不一样。

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尤其重要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投资力

度并不小，但没有带来好的经济增长，就是因为这些投资由政府和企业主导，而来自私人企业家的投资为零。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

尽管新古典范式主导着经济学的思维，但经济学家还是逐步承认，技术并不是外生的。所以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开始，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，提出了“内生增长理论” (endogenous growth theory)。内生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保罗·罗默 (Paul M. Romer) 201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一理论把技术进步模型化为知识生产问题，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知识的积累。由于知识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，并且一个人创造出来的知识谁都可以用，在政策导向上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重视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，同时，企业也应该加大研发投入 (R&D)。但非常遗憾的是，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没有企业家的位置，其所讲的技术进步是没有创新的技术进步，因而并不能构成一个正确的增长理论。

另外一个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。凯恩斯主义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，而非经济增长，但慢慢演变到最后，现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142

